

「物趣」與「物論」：
《聊齋誌異》物質書寫之美典初探

高桂惠

**The interest and the critic of the objects:
Exploring the beauty of object description in
Liao-zai-zhi-yi**

Kao, Kuei Hui

淡江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第 69~94 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5, P. 69~94, December 201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in Taipei

「物趣」與「物論」： 《聊齋誌異》物質書寫之美典初探*

高桂惠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本文試圖透過《聊齋誌異》的物質書寫，考察其感知與認知雙向涵攝的辯證思考，文中首先藉〈鴿異〉的闡釋，指出蒲松齡承繼了博物的傳統，透過主人公對「動物」的養育與命名先予以物化，但蒲氏又以主人公「物癡」的浪漫精神和動物進行神秘的審美觀賞與精神交流，來解消人類對他物的佔有與消費，由此思考人類習慣性對待他物的態度和文化。其次以〈八大王〉為例，說明蒲松齡以民間獲寶心態為基礎，在人類對寶物趨避之間，既賦予它道德的傳統意涵，也加上療癒的新意涵。最後，由〈余德〉的敘事為中心展開「物觀」考察，由物質的賞玩與幻滅，表現出作者對人類操縱「奇貨」的精神反思，《聊齋誌異》物質書寫實承載了人類情志與價值體系的多重對話。

關鍵詞：物質研究 聊齋誌異 物論 物趣 美典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99-2410-H-004-210MY2 之部分成果，初發表於「第十二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主辦，於 2011 年 5 月 13-14 日，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之意見。

「物趣」與「物論」：

《聊齋誌異》物質書寫之美典初探

高桂惠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前言

《聊齋誌異》的志怪書寫其敘事動力來自演繹稀奇怪異的物相與亦幻亦真的事件，其敘事效果則在想像與認識論的層面，挑動、引導讀者「想像」他界。它統合了兩種話語：一種是有關知識與真理的話語，另一種則是夢想與傳奇的話語。因此，筆者將《聊齋誌異》中的「物論」與「物趣」理解為一種敘事構造；它涵蓋超自然的、奇異的與非經驗的因素，但又將這些因素合理、「自然化」，並藉助這種「認知的陌生化」造就一種新的逼真性。這種逼真性是可認知的，因為它與傳統道德意識型態及其書寫相關聯；它又是陌生化的，因為它展現了一個觀念上的「新世界」，與作者、讀者所經驗的現實大有不同。

本文嘗試由《聊齋誌異》中的「物趣」與「物論」，考掘物質在故事中開啓感知與認知的歷程，當不同的敘事話語相互衝撞時，讀者便不再能自在地談論「習以為常的現實觀」；而當不同的敘事相互矛盾時，「陌生化」也成為一大問題，「志怪」吸納怪奇之物的過程，催生、引領讀者進入一種新的感知和認識，這是一種文學以及思想的多方面嘗試，本文希冀在小說各層面探索現實與情感的疆界，更希望開啓多重的對話。

本文為筆者一系列「物質研究」的初探，筆者將「物質研究」定義為寬泛的「物化」眼光，當他者以「物性」的存有成為主人公「游目」與「騁懷」的相對

性客體時，是否可以反過來定義主人公之感知、審美以及認知？文中所選擇的三篇故事帶有參照性：前兩篇是動物與人的互動，企圖闡釋在「民胞物與」的文化慣性思維之中，蒲松齡如何從「物自身」出發？在人類民俗采風、博物傳統習以為常的物我關係基礎上，「他物（動物）」作為一個定義的對立面，作者如何聚焦「物」的認識論，以及在人類與物的互動中之種種想像，如何以文學手法使「物」成為審美的對象，並進而反思主體如何界定物質，而物質又如何透過「物質性」及其運用反身影響主體，甚至改變主體、成為另一種主體？

後一篇故事則進一步由「賞物」的文人化視野切入「物觀」，相較於「采風」與「博物」的相對素樸，「賞物」更具文明化的進程，當「物」因為癖好而轉變為「奇貨」時，其「物觀」勢必承載著某種被操縱的意涵，蒲松齡對此「操縱性」究竟有何想法？

本文三則故事的探討背後有兩個面向的討論基礎，一是立足於深層的文化思維，為貼近《聊齋誌異》特有的采錄特點，本文選取〈鴿異〉與〈八大王〉為討論焦點，試圖探究相近故事群由素樸的采風、博物到回應民俗文化的文學母題，以及回應傳統德色議題之多元面貌；其次，在〈余德〉這一篇則將討論視野拉到明清物質文化特有的「文化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作者如何透過記憶中的「物質」，去釐清記憶與物質兩組力量之交換（或交流）？明清文人擅長製造「奇貨」以及「奇癖論述」，拈出〈余德〉，既有重讀《聊齋誌異》的「物觀視角」之用意，也是為了呈現蒲氏「采風」、「博物」、「賞物」的「物觀光譜」。

一、博物、采風及物癡的衍化——以〈鴿異〉為主的討論

筆記小說自魏晉六朝時期興盛以來，即具有「博物」之思維向度，六朝時代同時也興起了「州郡地志之書」，顯示了文人對異物、異聞的采集興趣。清代筆記小說在上承志怪小說遺緒的發展狀況中，實際上更產生了在地視野的書寫特色，以《夜雨秋燈錄》、《夜雨秋燈續錄》為例，二書中所反映出來的揚州風俗，如〈雅賺〉、〈千年冥吏〉等篇對於揚州富商如何企圖藉由賺取鄭板橋畫作以附庸風雅之行爲都有清楚描寫，反映了清代揚州地區商人與畫家之間的關係，也對於

富商熱衷於廳堂、書房懸掛名人畫作的現象有所勾勒。

筆記小說因其「博物」特質而成爲文人所易於採取以狀物之文體，其對於在地物產之描寫誠然具有在地關懷之心理，但面對「非常之物」則是改採以一種防衛並且藉由貶低他者以提高自我的心態進行書寫，甚至是回頭追溯自身文化中類似於此一奇特器物的描寫，以求將「異」於自身之他者，藉由書寫活動而使其從「非常」成爲「常」，在在顯示出筆記小說面對怪奇之物的看法。

而從文體的角度來討論，又可發現由於筆記體「博物」之知識特性，甚至有些小說具備了說明、介紹之性質，如〈琉璃〉、〈水晶眼鏡考〉、〈人蔘考〉其實具有科普知識，甚至在文類歸屬上都接近科普散文，這種志怪中的物質書寫轉化爲鄉土記憶、科普視域甚至是朝貢眼光等多重視野，是經過漫長時間的意義生產與價值轉換的過程，也凸顯了人們對於自身存在的某種思考和感受。

（一）世俗與習俗採錄的多重視野

相較於清代筆記小說「博物」之知識性，《聊齋誌異》中「物性」之書寫主要以物趣爲多，物論則相形略少，蒲松齡所書寫之物趣，一方面是表現爲對戲法或魔術之把玩。如卷三〈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請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①

或如《聊齋誌異》卷四〈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②

①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原中華書局張友鶴校本景印），頁306。

這兩篇故事皆以市井變化之戲法為主題，書寫之間又帶有市集人聲雜沓之圍觀，在觀看中充滿庶民之趣，通過物品變化本身即可感受到其趣味的散播，當作者帶著采風的使命紀錄時，穿插著以某人氏目睹來呼籲作者傳抄，以增添臨場感與真實感。

另有一種對「異聞」更為突出的紀錄，如卷九〈澣俗〉：

澣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群鼠入米盎，驅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瓢水灌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官，官原而宥之。^②

故事從人可以化物的習俗切入，一個外來者不知道「澣俗」，因而誤殺了一家人，僅存的兒子於是訟官。這篇故事非常簡短，結尾沒有任何評論，但是由看似實錄的筆法中，將一地之習俗與一般人之認知，以及官府之判案三個面向並置，深化了采風的筆記書寫，融合了在地視野、普遍視野與官方知識，引發了一種對動物權與生命權判斷的思考。

此外，透過動物習性的細膩書寫，往往也可以由「博物」轉化為更深層的人性反思，如：《聊齋誌異》卷九〈大鼠〉藉著一隻外國進貢的獅貓展現了對比式的物情，故事以老鼠與貓兩隻動物之間的體型與反應作為書寫主體：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遍求民間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眾咸謂貓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貓聲鳴鳴，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

② 同前註，頁 576。

③ 同前註，頁 1176。

其情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④

透過人類暗中窺視的視角，細膩的描寫貓與鼠的習性，挑起了對人類認知匱缺的反省，人之於萬物的存在隔著許多的認知差距，在暗中窺視時面對動物習性的描寫，充滿了反差效果，並由此回溯自身存有的反思，以老鼠比擬為「匹夫」之勇，而獅貓以靜制動則是以智取勝的典範，本篇故事乃以物情照鑑人情。

（二）由物情、物癖到物癡的流轉

《聊齋誌異》中寫了各種物性，有時甚至是一種物癖，故事中指出愛物成癡者甚多，然而卷六〈鴿異〉一篇則又反向提出另類思考，本篇故事一開始即以名類聚，具有傳統博物的興味：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蜨，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⑤

接下來故事描寫主角張幼量對鴿子的呵護與癡情：

鄒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癰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⑥

④ 同前註，頁 1203。

⑤ 同前註，頁 839。

⑥ 同前註。

作為一個照顧者，像照顧嬰兒般的細膩，接著故事以極大的篇幅透過主人公與白衣少年一起「寓目」所愛之物，經由白衣少年的帶領，在月色中兩次召聚一對鴿子展示舞姿，蒲松齡透過養鴿人的眼欣賞鴿子的曼妙：

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亦生平所好，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壙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鬥，每一撲，必作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鷺，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脅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⑦

在月色中，作為被觀賞的物，其色澤、聲音、樣態、舞姿，甚至是「脅肉」、「臟腑」，雖然「狀類常鴿」，其實具有「非常」之性。

白衣少年餽贈張幼量一對鴿子，兩年後「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

⑦ 同前註，頁 839-841。

也。」然而卻在父親的高官朋友詢問鴿子的情形下「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對方竟然不知道那是張幼量「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的割愛，予以烹食了，接下來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

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其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鞞韃』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⑧

此一情節也是一種對「贈物」與「食物」的反差認知，二者對禽鳥的感受迥異，頗有德色的某公但知其味，卻不知牠是特殊品種。對此馮鎮巒和但明倫都有評論：

〔馮評〕削圓方竹丈，漆却斷紋琴，世間煞風景事最多。因想天地間有以絕世妙文求賞識於妄庸巨子之前，誦之者搖頭掉臂，作龍銀虎嘯之聲，而聽之者指東話西，成口應心違之狀，豈不冤哉！^⑨

〔但評〕臭味差池，有何異處。^⑩

〈鴿異〉開啓的思考是多面向的：馮鎮巒聯想到文章的際遇；但明倫則以味覺（品味）評論之，敘事至此，尚停留在人類對物的認知層面上。

接下來故事情節由「物」本身進行自訴開展：夜裡，張公子夢白衣少年責備他：「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⑪但明倫對此評論道：「以極愛之物贈諸不愛之人，我雖珠玉重之，彼直鼎鑊殘之耳。即不至是，亦未必果如我之保護也。故交際之間亦不可不慎。」^⑫被作

⑧ 同前註，頁 841。

⑨ 同前註。

⑩ 同前註。

⑪ 同前註，頁 841-842。

⑫ 同前註，頁 842。

為禮物的鴿子，帶有雙重面向：一方面是秩序化的意涵：因為受禮者是父親的朋友，這是正式的、社會性的交換，所以張公子期待對方致謝；另一方面則是超越社會秩序，抽象性的意涵。當初白衣少年夜晚邀約張幼量並贈鴿，在整個社會的交換體系中是一個溢出的機制，那是一種不冀望回饋的託付，物件不具備實（食）用功能，或是在日常生活活動、謀生活動中不被使用。

但明倫即將物的流轉放在「交際之間」予以觀察，一般被選來對財富和權力地位進行物質化的禮物，藉由「物癡」的概念，帶出另一些結合／倒置之關係的新功能。篇末「異史氏」的觀點是相信「物」本身有其主動性：「物莫不聚於所好」，只是「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而已。就這一點而言，但明倫更擴大了「物癡」的範疇：

〔但評〕「鴿異」，何為而作也？凡聖主之得賢臣，志士之遇良友，推而至於烈士之劍，世家之書，善書者之遺蹟，善畫者之藏幀，及金石珍玩之物，真知之，故好之；真好之，故求之；求而得之，則養之、保之，防護而愛惜之，心盡矣，能事畢矣。以此自詡，可無愧矣。顧或既拔其尤，且以其彙，亦知寶貴，不輕示人；而乃勢利薰心，夤緣枉己，遂致剗心割肉，抵玉投珠。豈知好龍者非真，獻璞者莫辨。贈之者頗有德色，受之者視若尋常。僅堪一饗之供，誰是千金之重？不特聞風者半途反駕，絕跡不前；及其已至者，亦必各傷其類，相率而遠去矣。豈獨鴿為然哉！¹³

對於「物」的喜愛／厭惡、稀有／平常乃是一種主觀認知，愛物者若不解此意，其炫物之情必不能獲得認同，誠如但明倫評所言：「贈之者頗有德色，受之者視若尋常。僅堪一饗之供，誰是千金之重？」當然，蒲松齡還是肯定物癡之人，從其言，只是提出「物」的價值觀，在「易物」與「獻物」的過程中必須重新思考「物」的象徵意涵與交換（或交際）意義。

¹³ 同前註，頁 843。

本篇故事從鴿子的繁複名目起始，透過主人公「博物」者式的「按經而求，務盡其種」的收集物癖，逐漸深化「物癡」的進程，接著某夜帶領主人公一起「寓目」於鴿子的少年是「無名」的，而最後才點出慘遭鼎鑊的特殊品種鴿子名曰「韃靼」。故事情節在某種意義上是繞著一系列「名」的展演進行的，無名少年稱被食用的鴿子為「子孫」、「兒輩」，可見物情猶如人情，「異物」所召喚人的是一顆赤子之心。¹⁴

此外，人鴿一起欣賞鴿子的夜晚才是擁有珍物的關鍵，這種抒情式的觀賞，乃是一種「無名」之樂，「寓目」與「物癡」是穿透人／物界線之所在。透過抒情的眼光，蒲松齡試圖以白衣少年的神秘性與浪漫氣質來取消博物式的命名、佔有、消費，轉而由此帶領讀者思考人們習慣性對待物質的態度和文化，進而以「鬼神之怒」反過來重新定義人與物的深刻關係。

二、「寶物」作為耽美與藥石的療癒想像—— 以〈八大王〉為主的討論

劉慶紀由幻術母題與明清通俗小說的比較指出：幻術的類型至明清通俗小說有許多變化，如寶鏡類型由鏡子之炫目、顯影與避邪等思維出發，至明清小說之寫作將其作了更多元的發展，有時成為一空間連結之出入口。寶物之間的鬥法演變為明清小說中的一大主題，在戰爭主題的影響下，使得幻術有所創新，而且在小說篇幅的增加下，對幻術運用之想像力更為奔放，原本作為故事陪襯之用的幻術運用往往躍居為故事主體。¹⁵

《聊齋誌異》當中有不少致富故事是來自於異類之饋贈，例如〈荷花三娘

¹⁴ 余習惠指出〈鴿異〉故事是將人與鴿之間的相知以反面角度加以描寫，突顯了《聊齋誌異》中癡迷者的形象塑造，以及在這背後所隱含對於赤子之心的美學追求。詳參：余習惠：〈「癡」——《聊齋誌異》形象塑造的美學追求〉，《株州工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06年11月，頁78-80

¹⁵ 劉慶紀：《幻術母題與明清通俗小說》（大連：遼寧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子》、〈嫦娥〉、〈阿纖〉等篇，就是在寶物饋贈的關鍵情節中開展的。張玲曾說：「如果說《聊齋誌異》中的情愛之海是蒲松齡內心深處情欲的折射的話，那麼這些情愛之海上泛著的物質之舟則是作者心理潛隱的物欲的外化，也是其對改變自身生存困境的強烈渴望」。¹⁶從此角度而言，士子之獲得財寶饋贈，從六朝志怪小說的早期寶物崇拜、神物傳說以及帝王仙道追求等面向的發展，到了清代志怪小說，對於異類饋贈財寶的變化，物與人之間從集體到個人的關懷面在多元脈絡的搏化下，蒲松齡究竟承繼了什麼？又開啓了哪些思路？

（一）「報」的體系——個體身份與群體屬性的辯證

《聊齋誌異》卷六〈八大王〉是透過「物」的「交換」與「交易」重新檢視「外在物質」與個人「內在道德」之間是否能夠維持同等對價關係的思考。

小說述寫馮生家道中落，但仍言其願與漁人以物償債，則將二人之間的交換模式從金錢的債務關係拉回到較為原始的「物質交換」狀態，然此種述寫不僅是爲了埋下情節伏筆，¹⁷更是爲了將馮生個性中對於道德一面的處理加以突顯，顯示其不爲財貨所羈的價值取向，這也使得其後馮生「得寶」—「失寶」的過程在故事起始已經獲得定調。

小說其後描寫馮生得漁人所獻之蟹，卻以其狀異而放之，之後於道路上偶見一「醉人」，小說花費甚長篇幅描寫醉人情態，評點者亦多注意到蒲松齡在此處對於醉人的情態描寫，但在這些描寫篇幅中，醉人問馮生爲「何人？」馮生答以「行道者」，卻激起醉人之「怒」，意欲加以逼脅，又使馮生「不耐」，這些描寫都可以看出小說對人物情緒描寫部份的重視，而馮生問醉人「何姓名？」醉人則答以「我南都舊令尹也。」這裡蒲松齡將個人姓名與二者情緒表現相互連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姓名」標誌著人的個體身份及其在社會中的群屬，這顯示出姓名作爲一種「人」的符號意義而成爲小說中加以使用的資源，實際上是呼應了小說末了異史氏對於蟹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的提醒。小說針對二人的爭執

¹⁶ 張玲：〈論《聊齋誌異》中窮書生的物質世界〉，《語文學刊》第1期，2008年，頁14。

¹⁷ 馮鎮巒於此從情節結構的角度而評曰：「伏下」。同註1，頁868。

透過馮生的自道姓名而加以化解，藉由醉人聽聞馮生名字而「變怒為懽」的述寫，將小說情節加以開展，使得「報恩」主題重新躍出。

而在其後飲宴過程中，馮生更勸戒八大王應當戒酒「改行」，八大王聽其勸戒之後，更以鰲寶相贈，但明倫注意到小說中描寫馮生與八大王關係的微妙之處，直言「前之放之，生之也；後之戒飲，亦生之也。有好生之德，其報之也亦宜。」¹⁸這就將二人關係重新拉回到「報」的體系之中，而馮生不僅具有放生之德，同時還以其戒飲而有德，馮生之德進而與八大王生命之存續相互關涉，形成二者之間在「報」關係上的發動原則，不僅回應了傳統小說書寫中的德報架構，同時還隱射了物質交換與個人道德關係之間的關聯。值得注意的還有八大王所贈予之鰲寶，實際上並非令馮生永遠擁有，而是有其「使用期限」，其目的在令馮生「如願」而已，這裡所描寫的關係誠然是以有形的物質以回報無形之道德價值，但是禮物的贈予以及收回，卻又突顯出了外在物質不可能恆存的現實因素。如果所謂道德獎賞並非必然，且並非永恆擁有，則個人內在道德是否仍然可被視為「交換的資本」，又或者說：蒲松齡對於個人內在道德的存在是一種讚賞或者是一種徒然的感慨？這就牽涉到接下來的情節如何描寫鰲寶怎樣幫助主人公遂願才得以理解了。

（二）照鑑留影——耽美與德色意識的對照

故事接下來交待了馮生以鰲寶而識寶的情節，更重要的是小說描寫馮生得到一面能夠留影的鏡子：

得一鏡，背有鳳紐，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但評〕此鏡也，人皆以為寶，余則以為殃，將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寢案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

¹⁸ 同前註，頁 869。

藏之。年餘為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三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¹⁹

《聊齋誌異》卷九〈鳳仙〉另有關於鏡子留影的故事，鳳仙的鏡子能夠藉由鏡中人的影像激勵劉赤水勤勉向上，而馮生所得之鏡則可留住其所照射之女子影像，且能不斷更換鏡中人的影像。如果說〈鳳仙〉中的鏡子實際上反映的是功名利祿的獲取問題，那麼〈八大王〉顯然對功名利祿毫不關心，反而是對於寶物的獲得是否具有其意義而展開思辨，這也顯示出蒲松齡對外在物質應否被人類所恆常擁有之課題的相關思考，特別是但明倫從「匹夫無罪，懷璧其罪」²⁰的角度，討論馮生得寶情節所帶來對於個體生命的威脅。

劉衛英曾從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社會心理學等方法論去審視文本中的寶物，並指出以「文藝美學審視，可見明清小說寶物描寫的模式化，既是古代小說文體的通俗化與史詩化，又促進此進程。寶物構成小說情節發展、人物行為前提，寶物意象韻散相偕的場面渲染，延宕了小說敘事時間，暗示出特定人物心理活動。」²¹蒲松齡在處理特定人物的心理活動有著極為繁複的思考，他將馮生的內在道德透過馮生妻的書寫策略，實際上又將德／色議題納入了小說的敘事框架之中。小說描寫馮生所以將肅府三公主之影留攝於鏡中，即是因為三公主「絕美」，而當馮生因此觸怒了郡王，即將遭斬之時，卻因三公主之「賢」救助了他，但馮生面對郡王進而要他休妻另娶公主的要求，卻以「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言論站穩自己的倫常立場，而馮生妻「以珊瑚鏡臺納妃」、「歸修聘幣納王邸，齋送者迨千

¹⁹ 同前註，頁 870-871。

²⁰ 同前註，頁 871。

²¹ 劉衛英：《明清小說寶物崇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3。

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²²的種種救援舉措，實際上也是馮生得以獲救的原因之一，但明倫即言：「…鏡臺一獻，姊妹偕歸。否則即身能倖免，而糟糠之妻，已為泉下鬼矣。」²³

在古典小說的婚戀故事中，劉藝指出漢代《神異經》記載了「破鏡重圓」的故事，自此「鏡」之分合即象徵夫妻的情感，發展到後來，「鏡」還帶上了性愛色彩。²⁴蒲松齡借用此一書寫意象，寶鏡在這裡又進一步推進到生命的交換過程。如果將馮生妻的贈物與八大王的贈物序列相對看，禮物的交換對象實際上都是個體生命的存續，顯然就這個論述脈絡來看，物的存在與持有往往具有傷害個體生命的可能性（八大王對酒的沉湎、馮生對鰲寶的使用），但是生命的存續卻又弔詭的依賴外在物質的交換與饋贈（八大王的贈寶、馮生妻的納聘）。這篇故事將「夫妻離合」的傳統主題與「攝象留影」的耽美欲念並置，牽引出德色意識與倫常秩序在寶物綺想中的嶄新元素。

（三）寶物禍福觀——從得寶到失寶的療癒想像

小說最終描寫八大王向馮生索回鰲寶：

生一夕獨寢，夢八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大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²⁵

但明倫評道：「財物過多，耗人精血，損人壽命，此亦藥石之言。」²⁶這段評論誠然饒富趣味，尤其八大王將馮生戒飲之論視為藥石之言而贈與鰲寶，但最終取走鰲寶之時，又言「物」將會損人壽命的事實，但明倫將其視為一種藥石之言，這

²² 同註1，頁871。

²³ 同前註。

²⁴ 劉藝：《鏡與中國傳統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頁31。

²⁵ 同註1，頁871-872。

²⁶ 同前註，頁871。

就顯示出禮物的饋贈的確在一個對等關係上同時進行，而這段話實際上也可能具有另外一種屬於中國人思維的思考。如果檢視馮生得寶到失寶的歷程，這段物會損人壽命的評論實際上恰好是馮生即將遭斬的人生經歷之展現，也唯有經歷此種過程，方能對於「物」有更深一層的思考，才能夠最終棄物而「遂如常人」。

王立在〈《聊齋誌異·八大王》的西域傳說源流及文化意義〉一文曾辨析〈八大王〉故事中的「鰲寶」來源與民俗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強調「鰲寶」的相關描寫作為一種文學母題，其實與「動物獻寶報恩」、「胡人識寶」兩個文學母題有緊密關聯，特別是「鰲寶」又有著聚寶功能，或是可使其擁有者具有發現寶物之能力，顯示出該母題的特殊性。而在《聊齋誌異·八大王》中，「鰲寶」功能的描寫還與寶鏡崇拜相結合，其實也反映了明清時期民間對於獲寶的心態描寫。²⁷

馮生與八大王之間彼此勸誡激勵，互為藥石，「寶物」的階段性存有，暗示著「鰲寶」的聚寶功能，或者說，擁有者具有發現寶物之能力，才是溢出常人的危險性關鍵，這關鍵不在於其「寶」，而在於其「多」，寶物接近神聖之物，它們具有價值，但不交換，因其衍生價值的能力人類無法掌控。所以對寶物趨避之間，蒲松齡賦予它療癒功能的新意涵，故事末了在充滿史鑒意識的副文本〈酒人賦〉中引出「酒」的正反功能：

異史氏曰：……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為『酒』。其名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為懽，以合羣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鉤』，又以為『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²⁸

²⁷ 王立：〈《聊齋誌異·八大王》的西域傳說源流及文化意義〉，《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6期，2008年11月，頁149-152。

²⁸ 同註1，頁873。

異史氏的這一段文字採用了類似江淹〈恨〉〈別〉二賦的傳統書寫，總括「酒人」類型，若將此總論式的文字與前面情節對照，但明倫點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²⁹討論馮生得寶情節所帶來對於個體生命的威脅，這裡的威脅和小說開場八大王沉湎於酒一事呼應，則異史氏最後的〈酒人賦〉對物我關係重新界定有著更為繁複的思考面向。

首先從八大王沉湎於酒而有害於其行的角度解析，可以發現外在物質確實影響了個體在行為上的變化，而馮生之得寶，實際上更顯示出物質本身對於生命的威脅；然而，正如物質本身的消逝與不可恆存性所揭示的，〈酒人賦〉中亦言：「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³⁰但明倫也指出「酒以人傳，從來僅見；人以酒醜，振古如茲。非酒之果能醜人，彼自醜而累酒亦醜耳。」³¹這顯示出蒲松齡在物／人關係上實際上的思考，乃是在對人之內在道德的肯定之下所開展的，而物之存與逝，實際上不應主導或干涉人之行為。由此來看，當鰲寶最終為八大王取回時，馮生「從此遂如常人」的描寫，誠然就有了其在「常」與「非常」之間的價值取舍的意義，酒與鰲寶幻化的物世界，折射出其與人類世界互為救贖療癒的存有。

三、從物用到賞物——以〈余德〉為主的討論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造就了新的「物觀」³²，而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再加上西方物質的傳入，致使人們對器物製作、使用的理解更為豐富多元，這之間對百

²⁹ 同前註，頁 869。

³⁰ 同前註，頁 873。

³¹ 同前註。

³² 例如毛文芳便曾以晚明文震亨《長物志》為例，指出：「《長物志》並不依循中國歷史上搜怪獵奇的博物傳統，是將物置於日用生活的範疇裡，包含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衣飾、舟車、蔬果、香茗等十一種架構日用生活中的物類元素。該書是生活用物的總覽，環繞著日用生活而展開，由最基本對物的認識、到應用、製作與評價，幾乎涵蓋了物各個層面的知識，為讀者提供經營生活的指引。」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頁 59-60。

貨萬物與人的關係由傳統生活到日益繁複的商業化生活歷程，志怪書寫承載了物觀的擗化現象。

（一）由「怪」到「奇」的物觀——實用、神秘、解魅

如果從描寫「瓶」的故事為例，可以觀察到《聊齋誌異》往往透過情節及小說敘事者對故事的評論，或是小說異史氏的總結對故事所發之議論，形塑出小說家對於故事中所描述物質的另外一套解釋與評價系統，特別是小說對於瓶子能夠吸引、封印、困禁「非常之它物」的描述，蒲松齡往往透過敘事者引述他人傳聞的方式產生了另外一些詮釋。如《聊齋誌異》卷五〈農人〉與〈酒蟲〉兩則故事中分別描寫狐狸與酒蟲受到容器內容物的引誘，當牠們一旦掉進容器，則無法脫困。例如：狐狸因為將頭探入食器內部，因而「器囊頭，苦不得脫」，酒蟲則是「直墮酒中」而不能出脫於酒瓶之外，小說敘事者描寫狐狸貪食陶器內所盛饘粥，而酒蟲受酒香引誘的書寫，顯然都由其習性出發來描寫。

《聊齋誌異》之後，有些小說家對這一類題材也予以關注，如《子不語》卷十七〈鼃殼亭〉一則故事從全知敘事的角度描述船戶因為熟知巨鼃習性，所以爭相以豬肚作餌引誘巨鼃進入空酒罈之中。這也是以酒罈作為一種容器的有限空間出發，企圖誘使他物進入其中，從造成巨鼃行動能力受限的以致束手就擒，對於酒罈本身具有的容納功能及其空間屬性、內容物的特性，都是由日用物觀到與動物物性的掌握，提供我們對人類生活智慧的一種理解框架。

除了上述篇章涉及動物習性的觀察，透過故事我們往往可進一步對於「物」的來歷進行追問，呈現探究與懷疑的思考向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聊齋誌異》中有關容器如何限制他物（妖、鬼、動物等）活動能力的書寫，更多地是從容器持有者「主動封印」他物進入容器之中的角度進行書寫，使得容器本身更進一步具有神異性，而這類書寫往往與持有者本身是否具備道人、術士身份密切相關，與民間信仰的宗教思維有更深刻的關聯性。此外，在這類主動封印的故事中，容器的來源大致可分作二類，一類是持有者隨身攜帶，或者特意帶來用以收服他物的物品，一類則是普通常見的日用什物。例如《聊齋誌異》卷五〈荷花三娘子〉即描述了僧人以淨罈封印狐狸之事：

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罈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罈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黏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³³

僧人道出狐狸危害之事，並且以淨罈、盆作為封印狐狸之器具，突顯出容器本身具有的封閉性質足以限制狐狸的行動，而僧人書符二道的行為，則進一步強化了容器與方術之間的關聯。卷八〈盜戶〉同樣也以術士捕捉狐狸作為小說情節：

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³⁴

在這段描述中，術士以「符」作為捕捉狐狸的必要道具，使其與「瓶」這類容器相互作用成為捕捉他物的重要器具，顯示出這類容器本身與道法、方術結合之後形成的一套情節書寫模式。

又如：卷六〈胡大姑〉中，李成爻唸咒將狐狸收於酒瓶之中，小說在結尾處透過敘事者口吻道出一般人對於李成爻捉捕狐狸一事的看法，強調有諸多人聲稱李成爻家中壁間掛有數十個瓶子，其內皆是狐妖，而且李成爻總是依次將狐放出作祟，再藉由捕捉狐妖獲取酬金，把它們據為奇貨。故事的後半部將瓶中的狐進一步地物質化了，狐不再只是一般認知的動物，或者是志怪小說脈絡中習以為常的作祟狐精，而是具有了工具價值與商品價值，成為有心人用以謀財的道具。蒲松齡這篇故事改變了以前狐妖的濃厚宗教意味，另外從被工具化的狐、瓶關係進行書寫，不再將「狐」視為一種作祟之妖怪，而是為人類所操縱的「奇貨」，改變了志怪小說原有對於非常之物的描寫興趣，大大增加了物化的角度。

³³ 同註1，頁683。

³⁴ 同前註，頁1086。

（二）賞物：物之異趣與情趣

《聊齋誌異》卷四〈余德〉一篇以尹圖南與屋客余德之接觸與其遺留物品寫出奇／異兼具的感知經驗，若以此為視角，可以三個層次之遞嬗觀察蒲松齡寫作之鋪陳。其一為即為「以人為異」——容貌來歷之異：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即來拜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逼知來歷？」³⁵

〈余德〉開篇即寫出余德一家之神秘感，由尹氏的不曾過問為始，逐步推向偶然相遇而被挑起的濃厚興趣。其次又通過妻子轉述形容之擺設賞玩之異，構築對此人來歷的好奇心，首次前往拜訪卻又撲空，惆悵的同時必然醞釀更深厚的興趣。然而神秘面紗卻未因兩人見面與宴飲而有所揭曉，余德的不予回應與尹圖南的不加追問，反而為往後情節的行進作一鋪陳。

其二為「以術為異」——擊鼓摧花術法之異。余德一家來歷之不明，並未妨礙與尹氏兩人之交遊；尹圖南再度應邀前往余德住處，便欣賞了一場落英繽紛的生動美景：

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

³⁵ 同前註，頁439。

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爲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即爲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由是亦奇之。³⁶

由人物來歷背景之異，進一步推展至其術法之異；此間以尹圖南赴宴的視覺感知爲主要描寫，而以屋內之陳設與術法之施爲主軸。文中先寫余德屋舍內的壁紙予人之明亮光潔感，次寫小爐薰香撲鼻；繼以桌上之碧玉瓶與水晶瓶花爲描摹，層層寫出余家之生活情趣，並同時爲宴中花開若蝶之奇術鋪陳。至此，尹氏不禁更以此人爲異；書寫至此，更爲往後之白石缸作登場之醞釀。

是以〈余德〉由人物來歷之異爲始，進一步推展至無形的術法與有形的石缸之異事：「以物爲異」。文本後段即以人去樓空後石缸之異作爲這一段特殊經歷之憑藉：

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爽。手入其中，則水隨手泄；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夜，忽解為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³⁷

〈余德〉巧妙運用石缸／水／魚等物質特性，在堅硬／柔軟及承載／被包覆等種種特質間，繼承物質本身原有特徵，並顛覆本有之認知。小說中設定白石缸爲一龍宮之物，正以他界之背景，爲石缸開展一遺世獨立般的空間，更藉現世具體物

³⁶ 同前註，頁 439-440。

³⁷ 同前註，頁 440-441。

質包容他界的物質特徵；故其臨冬而水不冰，缸破後游魚仍自如，缸中儲水之安然亦如石缸猶在。

或以缸之精魂仍居於其間，便無礙其異；但缸破亦是精魂佚散亡有之際。龍宮石缸與物之精魂，在超脫現世物質特徵的此際，卻又以其入藥可延壽之藥力而重返人間之物質序列。綜上所述，白石缸於文中誠然為一跨越現實與他界的媒材，其所懷有的雙重特性自然可從中理解。文末何守奇以其怪與異為評點視角，點出〈余德〉一篇之奇異趣味。

若自物質美感方面觀察，則〈余德〉一篇亦顯現明清的文人情趣。王鴻泰嘗論述明清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透過雅俗界線的改變與辯證不斷擴充賞物之內涵，強調文人性情與物交感的重要。⁹⁸〈余德〉篇中之品酒、薰香及瓶花、石缸等賞物，充滿了明清文人對物品賞玩以及對文雅生活積極營造的意象，藉由文人與物的感官經驗與情感交流，審視明清文人的生活情趣，及其所追求的由「隱」而「閒」而「雅」的生活型態。

此外，徐峰指出《聊齋誌異》中對於癡人的描寫實際上與明末以降之文藝思潮有著密切關係。這些人物形象寄託了作者的人生哲學，而且還反映了當時的文學精神，例如〈石清虛〉中邢雲飛對於珍石的欣賞，實際上正是一種「雅癖」，而這種雅癖是在晚明以降對於「情」與「欲」的肯定思潮中發展出來的。《聊齋誌異》中的癡人可分作「情癡」與「性癡」，情癡人物對愛情的追求往往與現實環境有著尖銳的對立，並且以超越常規的方式獲取愛情，突顯了至情的一面。性癡者表現出對某一具體事物有著特別的愛好，這些癖好大多與現實亂世有著緊密關聯，使得癖好的固執與現實環境呈現了對立一面，因而性癡更多時候反而具有批判性的文學價值。⁹⁹

〈余德〉的書寫雖是一種性癡的類型，但是蒲松齡並未以此對社會進行批判；本篇主要藉由「物證」式（空庭、燭淚、指印、石缸）的追認，在賞物的脈絡中凸

⁹⁸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22卷第1期，2004年，頁73-143。

⁹⁹ 徐峰：〈《聊齋誌異》中的「癡男」形象解析〉，《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06年2月，頁50-52。

顯其「奇」而已，這種單純的以審美為要的物趣，和清初文人風雅的政治化趨向與救贖性特質已然不同，⁴⁰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以「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召喚一種邊緣性的知音，是一種純粹精神性的想像，無意轉化為社會性的意義。

四、結語

本文是《聊齋誌異》物質書寫系列探析的初步嘗試，本於《聊齋誌異》一書兼筆記與傳奇二體的書寫，大大涵融了小說狀物、體物的功能，一方面繼承了從博物到采風的「物性」之紀實色彩，再方面涵納抒情美典的傳統，更開啓了感知與認知雙向涵攝的辯證思考。

因此，本文以《聊齋誌異》的物質世界之觀察與交流為焦點，透過相關的物質書寫考察，試圖由「采風」、「博物」、「賞物」的「物觀光譜」來切入，首先，透過〈鴿異〉一篇的聚焦指出：蒲松齡承繼了博物傳統，又透過物癡的神秘性與浪漫氣質來取消博物式的命名、佔有、消費，轉而由此帶領讀者思考人們習慣性對待物質的態度和文化；再者，由〈八大王〉的討論指出：蒲氏由明清時期民間對於獲寶的心態為基礎，反思寶物的危險性，在對寶物趨避之間，蒲松齡賦予它療癒的新意涵，寶物接近神聖之物，它們具有價值，但不交流。此外，透過〈余德〉一篇，切入在賞物的脈絡中蒲氏凸顯物之奇，是一種單純以審美為要的物趣，當一切奇貨以「物證」式的存有被故事化，這種風雅的賞物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想像，蒲松齡並未如明清（尤其是明清之際）文人將物質的佔有轉化為社會批判的家國意識，也沒有近乎耽溺的「雅癖」作為反抗的姿態。

整體而言，《聊齋誌異》透過對物質的凝視與佔有來測試人自身，有時物質的流動是故事中的關鍵情節，物質（如寶物、藝術品）往往在情節中帶動交換與交流的歷程，甚至超越交換與交流，折射出不同價值之間的對話，以及價值轉化。此外當小說中的關鍵物從物質的流通中撤退（如〈余德〉的「奇貨」），反而構

⁴⁰ 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35-76。

成了一個穩定的參考點，引發對於人類情志、生活形態、文化取向、社會制度以及價值體系（諸如：道德、禍福、倫常等等）的多重對話。

主要參考及徵引文獻

一、原典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原中華書局張友鶴校本景印）

二、專著

劉衛英：《明清小說寶物崇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劉藝：《鏡與中國傳統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三、單篇論文

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尚〉，《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35-76。

張玲：〈論《聊齋誌異》中窮書生的物質世界〉，《語文學刊》第1期，2008年，頁13-15。

王立：〈《聊齋誌異·八大王》的西域傳說源流及文化意義〉，《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6期，2008年11月，頁149-152。

余習惠：〈「癡」——《聊齋誌異》形象塑造的美學追求〉，《株州工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06年11月，頁78-80。

徐峰：〈《聊齋誌異》中的「癡男」形象解析〉，《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27卷第2期，2006年2月，頁50-52。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22卷第1期，2004年，頁73-143。

四、學位論文

劉慶紀：《幻術母題與明清通俗小說》（大連：遼寧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The interest and the critic of the objects:

Exploring the beauty of object description in

Liao-zai-zhi-yi

Kao, Kuei 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was trying to analyzed the object description in the stories of Liao-zai-zhi-yi. Through the acknowledgement of objects,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the objects, and turned materials into the objects of appreci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entioned three stories in the book of Liao-zai-zhi-yi which was written by Pu, Songling. The first story, the oddity of pigeon, it started from raising the animal as pet, treating the pet as a favorite object, owning the pet as its master, and even consume it as the mentality of ownership continue to grow. The second story, eight kings, Pu described how people were eager to own the precious object, and how ownership can turn into danger of confronting robbery or fear of losing it. In this story, Pu also gave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pproach-and- avoidance conflict toward a treasury. It has contained not only a traditional meaning but also yield the way of healing. In the final story, Pu talked about a stranger named Yu De who came to live in a village. Yu De's collection had raised curiosity, craze and greed of villagers. But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Yu De disappeared and all his fantastic collections were also vanished, nothing but

empty yard, burned candle, finger prints and broken jar left. This story has given readers introspective thoughts toward the oddity of object as well as its nature of disillus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bjects in the book of Liao-zai-zhi-yi has sprung the thoughts of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for readers. In the stories, throughout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objects, it has opened a multiple dialog for lifestyle, cultural trend, social system, mainstream value and for human's affections as well.

Keywords: object study, Liao-zai-zhi-yi, object critic, object interest, esthetics.

